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Tripitaka

李富华 何 梅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李富华 何 梅 著

汉文佛教 大藏经研究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Tripitaka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李富华 何梅著;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ISBN 7-80123-541-X

I. 汉… II. ①李…②何… III. 大藏经-研究 IV. B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209 号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

李富华 何梅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霍克功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125 印张 605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23-541-X/K·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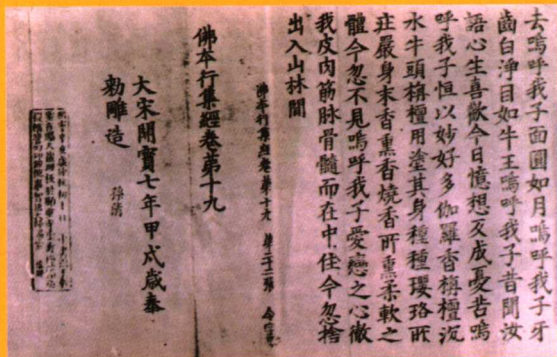
定 价: 48.80 元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老先生们校对《房山石经》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令時世尊
特着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
鉢乞已還至本家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
敷座而坐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
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
言希有世尊如來善哉諸菩薩摩訶薩
諸菩薩摩訶薩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
男子須菩提若諸菩薩摩訶薩欲求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
住如是降伏其心唯此修學願樂欲聞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住應
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外生若胎生若
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
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
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
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發心
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
不可不住也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而施
須菩提若諸菩薩如是而施不住於相何以故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北三五四六号



广西省博物馆藏宋《开宝藏》本



山西应县木塔藏辽
《契丹藏》扉画，采自
《应县木塔辽代秘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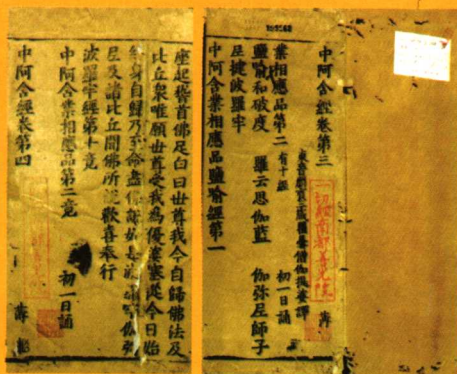
山西应县木塔藏辽《契丹藏》本，采自《应县木塔辽代秘藏》



山西太原市崇善寺藏宋《崇宁藏》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
藏宋《毗卢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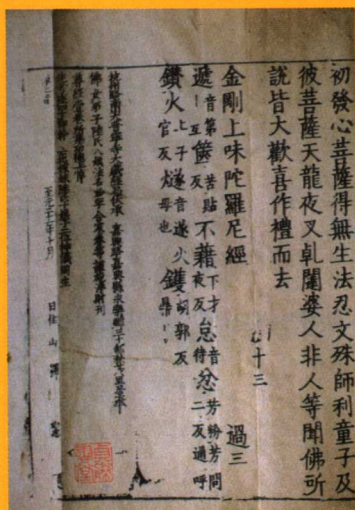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宋《資福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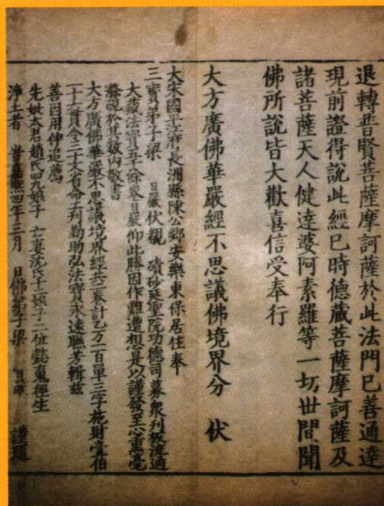
国家图书馆藏
金《趙城藏》



山西太原市崇善寺藏宋元《磧砂藏》扉画、龙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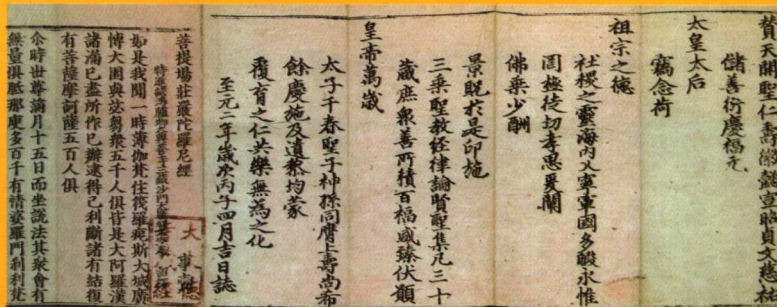
山西太原市崇善寺藏
元《普宁藏》本



山西太原市崇善寺藏
宋元《磧砂藏》本



云南省图书馆藏《元官藏》扉画



云南省图书馆藏《元官藏》本



四川省图书馆藏明《初刻南藏》本及木质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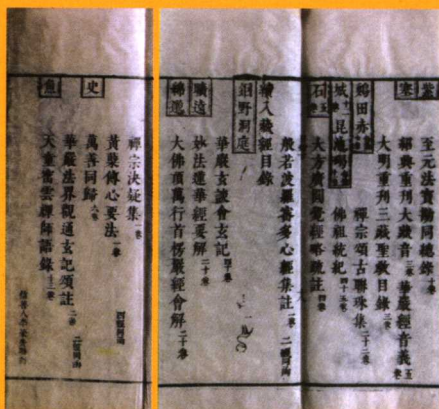
北京市法源寺藏明《永乐南藏》扉画、龙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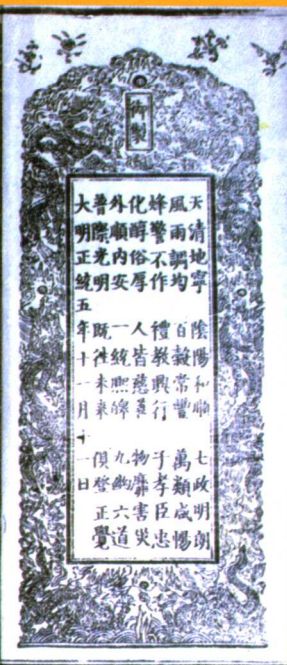
浙江省图书馆藏明《北藏》



北京市法源寺藏明《永乐南藏》卷末施经牌、韦陀像



山西宁武县文物馆藏明《永乐南藏》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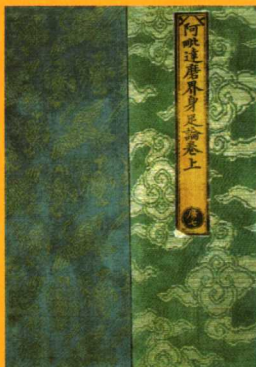


御制藏经牌、扉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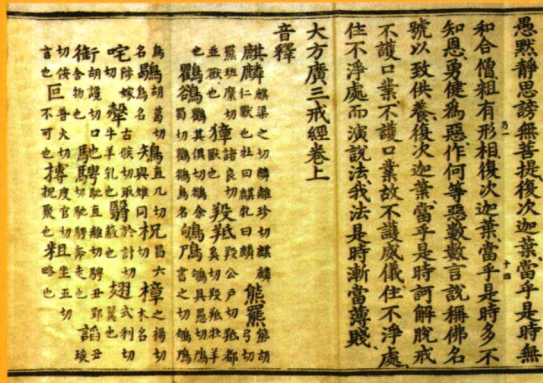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



浙江省图书馆藏明《北藏》卷末御制施经牌、韦陀像



浙江省图书馆藏明《北藏》封面



北京市法源寺藏明《北藏》本



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嘉兴藏》本

序

杜继文

中国有记事写史的优良传统,又是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地,由此生产的甲骨、金石、竹简、图籍及其负荷的文明,其古老繁多和完备程度,堪称世界第一,而汉文佛经就是负荷这一文明长河中的一段,一枝。然而就这一段一枝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和宗教积淀,已经足以给人们以历史的深厚感和文化的丰实感。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可以肯定是在纪元之前。它的汉文译籍和论著的问世,不会晚于东汉桓帝之世(147—167)。为了搜集、记录和保存既有的佛典,遂有佛经目录之作;这时间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著录编目,以及考究译籍的真伪和译人、译时、译地、译本,同时普集历来僧俗的有关论文著述,到了东晋道安而形成制度;梁僧祐进一步扩展,与高僧传的撰写并行,从而将说教的佛学和信仰的佛教,纳入了客观考察和学术研究的视野,成了中国佛教的一大特点,一大优点。因为只有客观考察和学术研究,才能为历史地认识佛教提供纪实的线索,和可以如实认识的基础。这一点,比较一下佛教在它的产地几乎处于无史可寻的情况,就会更深切了解它的价值。

佛教约自 10 世纪开始从本土逐渐衰退,到 12 世纪基本消亡。这种衰退和消亡是毁灭性的,它的经典只能保存在南传上座部的巴利语系和中国的汉、藏文语系中。一般说,巴利语系保存的佛典属佛教部派时代的作品,基本上没有反映佛教此后的多方面发展,更没有大乘的经律论。而且南传三藏也迭经修补变迁,现在的巴利文定本,可能完成于 5 世纪,说它最能反映原始佛教的面目,并不全面。藏传佛教,始起于唐代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中经波折,约 10 世纪复兴,因此,它所译介保存的佛教原典,多属晚期大乘;既缺少早期佛教文本,反映大乘思潮兴起时代的经籍,也不够丰满。相比之下,佛籍的汉文翻译要早得多,有史可考的成规模的翻译,始自 2 世纪中叶;到了 3 世纪末,已经是译家辈出,译籍相当可观了。相当于巴利文三藏的四《阿含》,则陆续译出于 4—5 世纪之交;它们的部分经典,译出的时间就更早了。就是说,除了少数藏传佛教的印度原典以外,汉文所保存的古印度佛籍,为数最多,而且也最为完备。如果要认识或研究佛教的全体或它的历史,而不能使用汉文藏经,我以为是不可能的。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是关系密切的兄弟两支,藏文大藏经中的不少经籍是从汉文中传译过去的,汉传佛教中历史上缺少的经籍,也在不断从藏文中转译过来。汉文大藏经收容的典籍还在继续增加。

大乘佛籍多以梵文书写。但梵文早已退出流通领域,近现代发现的梵文佛典,大多是 10 世纪前后的产物;它们大都在藏、汉文译典中有所保存。然而汉译佛典依据的原本,既非完全是梵文经,也不都是什么古天竺语本,至少在南北朝以前,主要是西域各国语系。就此而言,汉文佛经更能反映佛教整体的演变轨迹,译籍它的全体规模。

“汉文大藏经”是一切汉文佛典的总称,是汉语文佛典丛书大全,既包括汉文译籍,也包括用汉语文写成的种种佛教注疏和著述。将这些既有的佛典搜寻和保藏起来,是从为佛籍编目就开始

了的事业。不过这事业由佛教信徒的私人操作变成由国家扶持主办,当与国家出面组织佛经翻译的历史同步,到了南北大统一的隋唐盛世,有了所谓“官写一切经”的称呼。这“官写一切经”,可能是后来一切“大藏经”的蓝本;据“一切经”编成的目录,称作“众经录”、“内典录”、“释教录”以及“三宝纪”、“法宝录”等。这是佛家经籍收集、整理和保管的最佳时期,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则是反映这些成就的代表作。

北宋初年雕刻的《大藏经》,通称《开宝藏》,就是按《开元录》规模印制的第一部雕板大藏经。它不但在佛教史上是划时代的,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有重要意义。此后历代公私雕印者不绝,而且迭有增补,收入的三藏和汉文论著愈益完备。正是借助这成套地印制技术,促使中国佛教得以空前地对外传播,在形成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在内的汉传佛教文化圈过程,起了重大作用。迄今为止,高丽时期覆刻的《高丽藏》,依旧是最完善的古本大藏经,与《赵城金藏》可称双璧。日本从镰仓时期(1192—1333)覆刻汉文大藏经开始,发展到现今流通最广的自编《大正藏》,所收汉文各类佛典之多之广,前所未有的。越南现存该国历代诸多宗师撰写的汉文佛籍,也属于汉文大藏经系列,尽管目前注意者还不够多。汉传佛教的流布,促进了中国与这些邻邦间的联系,强化了人民间的交流和沟通,也活跃和丰富了相关国家的思想和宗教文化生活。

富华与何梅同志的这部著作,就是专以汉文大藏经为研究对象写成的。当我初看到打印稿时,颇为吃惊,也很兴奋。没有想到它的内容会如此丰富,涉及的学术方面会如此之多。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的史的考察。一览目录,中国汉文佛籍历代编刻的浩瀚画卷就呈现在眼前。世人多以文化的悠久称赞中国,这悠久的历史都表现在哪里,它的底蕴究竟有多么厚实?看看我们已经保存下来的图书,在数不尽的图书里看看我们的佛教大藏经,可以见其一斑;而这一斑就比较集中和概略地展现在他们这部研究著作里。

我个人的工作性质,需要有关大藏经的历史及其内容和规模的知识,但要我一到图书馆里去查阅,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这部著作即可以满足我的一般需要,也为解决我的一些特殊问题,提供了信息和线索。可以说,此书反映了我国文明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则是一种深入,一个贡献。

此书与过去同类的研究论著相比,我感到有三个特点:第一,它将当前可能知道的,因而可以搜集到和查阅到的历代所有不同版本佛教藏经,细致地过滤一遍,对勘了一遍,所以所使用的资料,不论是原始程度和完备程度,都是首屈一指,很难与之匹敌的。第二,它对历代大藏经编辑和雕刻的特点,都有长短比较,分析评述,使读者能进入其中,全面把握这些藏经的演化以及每部大藏经的个性。第三,它以大藏经的雕印史为主线,旁涉当时的政治、思想以及有关人群的信仰趋向等诸多社会方面,这在其它文献中是很难了解得到的。因此,此书不但多有纠正前人的失误之处,而且有更广泛的学术价值。这里只举其第九章《明官版大藏经研究》为例:

此章开头就说,“《初刻南藏》以往称《洪武南藏》,这是不准确的”。作者认为应该改称《建文南藏》。原因是,他们在《初刻南藏》的原版中有了新发现,作了新探索。根据《初刻南藏》誉字函《古尊宿语录》刊记:“大明 改元己卯春,佛心天子重刻大藏经”云云的字样,以及证以明释居顶所撰《续传灯录序》所记“洪武辛巳冬,朝廷刊大藏经律论将毕”等语,考订所谓“大明 改元”中间那两个字空格,应该是“建文”二字,而后来被从印板上挖去了。因为史实是,明代“己卯春”改元,乃是由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改作朱允炆的建文年号,亦即“建文元年”(公元1399);所谓“佛心天子”,也是朱允炆的称号。至于“洪武辛巳冬”,历史上就不曾有过,因为那时朱元璋早已死了,实属“建文”三年(1401)之误。总而言之,本来是由建文主持、在建文时期雕刻的大藏经,后来建文的字样却被从

原板中清除了，代之以洪武年。历史就这样被篡改了。

如众所知，明代对宗教的管理是异常严厉的。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在大力强化文网、控制舆论的同时，对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都保持十足的警惕。而朱棣对建文帝的夺权斗争，牵连范围的广泛，惨烈严酷的程度，历史上也是非常著名的。《初刻南藏》被改动的这几个字，就透露出来当时那警戒之高和搜索的严密。

作者指出，洪武五年有诏，命四方名僧于蒋山点校藏经，但无雕经之旨；又在洪武十年前，令天下僧徒习通《心经》、《金刚》和《楞伽》三经，因而有了这三种经的刻本，但不是大藏经；此外，也有僧人私刻个别禅籍，更与大藏经无关。但由于《南藏》的被篡改，以至联系到洪武五年的点校，遂使现代学者也发生误判。吾师吕澂撰《明初刻南藏》就上了大当，误以为此藏始于洪武五年而完成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此藏为“洪武五年至永乐元年刻本”，犯的是类似错误。

富华和何梅同志还有许多其它新发现，成就是方面多的。关于印刷和装帧的演化，释音拼法的变迁，以及佛教与朝廷、官僚和一般民众的关系等等，也提供了不少可供研究线索。其所以能做到这样好，当然首先要归于作者们的勤奋细致，肯于动脑而不惜气力。例如，作者为了核对吕先生的引文“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并未轻信《已续藏经》印作的“洪武辛巳冬”，而是专程跑到上海图书馆查阅了原本的出处，即明宣德八年刻印的《圆庵集一续传灯录序》，这才印证了“辛未冬”实为“辛巳冬”之误。作者没有让权威学者阻住深入探求的脚步。我想，吕先生有知，对于这种求真不舍的精神，也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这部著作之所以会有这样多的成就，还有一个客观因素，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二位作者都参与了为时十三年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和校勘工作。这个工作使他们有条件能够接触到国

内所有可能见到的古本大藏经,并亲自一一翻阅。他们在研究中使用了藏经中夹杂的各种题识、墨记之类的原始记录,十分宝贵,一般学者就很难做到。他们在自序里说:“我们把它看做是《中华大藏经》事业的继续”,说明作者确是有心人。当他们的这一课题结项时,有专家说,像这样条件下的研究,恐怕到此为止了。这很有可能。

《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出版,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的重点项目,所用经费全由国家出资,参与校勘的队伍多达数百人,是我们国家文化建设上的一件盛事。它作为收集和保存历代佛教大藏经的文献,具有其它版本大藏经不可企及的优点;它作为国家的一大举措,意义也不同于一般。因为它的编辑出版,不是从信仰角度,也不是从“神道设教”角度出发的,而是把它当作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和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事业来办的。我们知道,如何对待文化遗产历来是有争论的,问题是首先需要把散乱各地的文献经书收集和保存下来。只有收集和保存下来,提供了解和研究的基础,才有全面评价和讨论如何运用的可能。我以为,凡是存在过的,都有自己的理由,都应有自己的历史地位;至于对这些遗产,或是化腐朽为神奇,或变瑰宝为腐朽,全在今人的运用。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脚踏现实,承接历史,建设现在,开辟未来。

顺便说明,已经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只是在历代大藏经基础上校勘成功的一种善本。事实上,历史上的所有大藏经都没有将已有的佛籍收集齐全,大藏经也不可能反映佛教发展的全貌。为什么敦煌藏经的发现,会引发学术界那么大的震动?就因为有些极有价值的佛典,并未入藏,而且其量可观。现在任继愈教授正在着手收集和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续编,我期望它的成功。

2003年9月16日